

慰安妇

The Comfort Women

GEORGE HICKS

[澳] 乔治·希克斯 著

滕建群 译

新华出版社

慰安妇

(澳) 乔治·希克斯 著
滕建群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慰安妇/ (澳) 希克斯著; 滕建群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011-5529-1

I. 慰… II. ①希…②滕… III. 日本—侵略战争—历史事件—1937~1945 IV. 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605 号

京权图字 01-2002-0161

The Comfort Women

Copyright © George Hicks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慰安妇

(澳) 乔治·希克斯 著

滕建群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插页2张 230千字

2002年10月第一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529-1/K·371 定价: 19.00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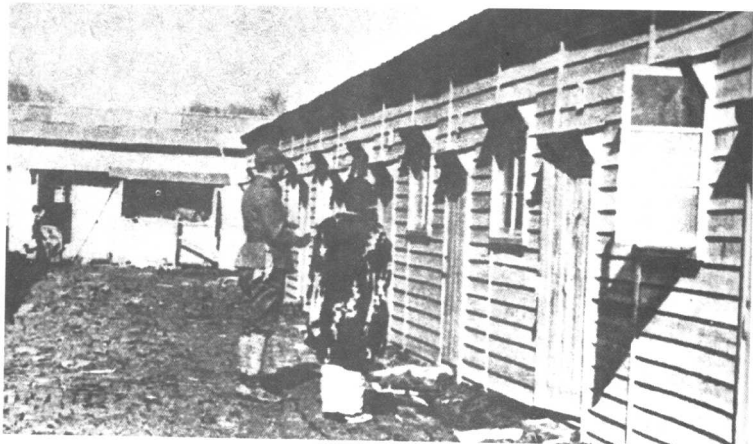
“妇女志愿服务队”应征者。她们中的一些人将被送到慰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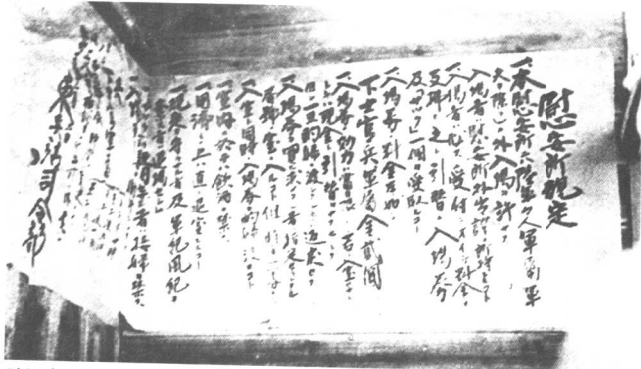
写有“圣战”标语的上海陆军慰安所门口



中国汉口慰安所前排队日本兵



1938年建于上海城郊的第一座陆军慰安所



张贴在上海城郊第一座正规陆军慰安所里的规定



1944年8月14日韩国慰安妇在缅甸北部密支那接受盟军质询



美军士兵与慰安妇在冲绳岛



参加 1991 年 12 月 6 日东京诉讼的 3 位“慰安妇”原告



前“慰安妇”每周在汉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1992年为死去的“慰安妇”举行的佛教安魂仪式

为什么要翻译出版这本书

滕建群

一、问题的提出

1993年8月10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细川护熙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我认为，那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同日，自由民主党内的3个与靖国神社交往密切的组织“报答英灵议员协会”、“遗属议员协会”和“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会”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抗议细川护熙首相的“战争认识”。8月23日，上述3个组织的领导人再次举行会议，提出共同设置一个“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会由76名众议员和29名参议员组成。委员会成立后，从1993年10月到1995年7月，共召开了20次研讨会，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史观，他们公然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1995年8月，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把它20次研讨的“成果”结集出版，书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在论及“慰安妇”题时，《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指出，“慰安妇”不是强征。现摘录如下：

“所谓随军‘慰安妇’的人数有10万~20万人纯属捏造，而断定随军‘慰安妇’都是被强行拉去的更是错误的。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允许‘公娼’存在的，通过经营者签订合同的占相当数

量。”

“日本政府发表官房长官谈话正式承认强迫妇女做‘慰安妇’，是没有根据的……在关于朝鲜半岛出身者的文件中，没有‘强迫’和‘强制’的记录。而附件中绝对多数是当时军方、内务省、朝鲜总督府对业主招募‘慰安妇’中不正当做法进行监督的行政指导，以及强调需要对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禁止对妇女施暴的报告书等。”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人自己造出来的。日本大分县有个左翼妇女到韩国去，说：‘你们要让日本赔偿战争损失，要争取补偿。这一切全交给我办。’于是，韩国很感动，他们的遗属会交出了一份名单，请她帮忙。当时韩国遗属会正在日本为滞留库页岛的朝鲜人问题同日本人打官司，负责这场官司的日本律师叫高木健一，他与另一位律师趁机介入了‘慰安妇’问题，并以他们两人为核心，联络了两个左翼团体，发起了这场‘慰安妇’问题的运动。这件事纯属日本人引火烧身，自找苦吃。”

“过去，日韩两国间的问题都根据条约解决了。日本曾拿出巨款，以期填补韩国巨大的外汇赤字。但韩国政府把这些钱都用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上，而没有发放到个人的手里。现在韩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他们才搞什么个人赔偿。这样，有些赔偿就追到了日本人头上。”

“为什么不调查在联合国成立之前的‘慰安妇’问题，不调查其他国家的‘慰安妇’问题，而只调查日本，还要求赔偿？答案只有一个：‘打胜了什么事也没有，打败了就要赔偿。’”

……

诸如此类，这些只是日本右翼对“慰安妇”问题的全面否认的一部分。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日本的右翼分子把大东亚战争看成是“解放战争”和“自卫战争”，把对华战争看成了“维护正当的权益”，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捏造”，把东京

审判看成是胜利者“复仇的仪式”……日本的右翼分子完全颠倒了黑白，以混淆视听。

二、为什么要翻译这样一本书

笔者是在 1997 年底接触到日本右翼分子写下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的。当时，笔者所在单位应邀针对此书做出反应，即出版一本名叫《是总结，还是翻案——兼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书，反击《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的反动观点。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笔者对“慰安妇”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并认识了上海的苏智良先生，他是中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知名专家。1998 年 9 月，笔者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里发现了澳大利亚人乔治·希克斯撰写的《慰安妇》一书，一口气读下来，觉得这部著作既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而且较为通俗易懂，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它介绍给国人。2001 年夏，经与北京新华出版社联系，终于能在 2002 年春夏之交把此书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参与本书翻译和校对工作的还有武铭、国仁、玉军、永民、明华等同志，最后由滕建群同志对全书进行了校订。

澳大利亚人乔治·希克斯是一位长期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此书中，作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事慰安制度的建立过程，介绍了亚洲各国妇女在日本铁蹄下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经历，分析了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所采取的暧昧态度，认为“慰安妇”问题并不只是日本人对那一代亚洲妇女的摧残。而今，在亚洲一些国家中妇女们仍面对着这种剥削和摧残，性旅游、娼妓业的低龄化仍在一些国

家和地区十分兴旺。作者指出，在这个父系社会中，妇女要赢得彻底的解放还尚需时日和努力。

可以说，乔治·希克斯是以“第三只眼睛”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军事“慰安妇”问题的，就作者本身来说，其观点相对客观一些，因此，这样一本书对批判日本右翼分子对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全面否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也是笔者把此书翻译成中文的主要考虑。“慰安妇”问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就在我们翻译此书之际，从东京传了日本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起诉的请求，“慰安妇”们再一次败诉了。这足以表明，要想使亚洲“慰安妇”们的冤屈得以伸张并非易事。能否尽早解决全要看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有关各国政府以及各国民间组织对这一问题的揭露和斗争。正如乔治·希克斯本书结束语的最后一句所说的那样，“种族歧视、历史健忘症（最近日本法务相坚持认为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一说）、因而不愿意正视过去和纠正现在的错误将促使日本继续成为国际社会的被遗弃者。它是一个经济强国，并因此而得到尊重，但是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都没有或者说很少有朋友。”从战后 50 多年的历史看，日本要想在亚太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应该重新反省过去，在诸如“慰安妇”等战争问题上向受害国做出满意的答复，否则的话，它只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头“孤狼”。

三、关于翻译《慰安妇》一书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出于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乔治·希克斯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并不完整和全面。在一些问题上，如把中国台湾当作独立的实体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在看到此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对此类政治性问题给予指出和批判。另外，

书中论及的“慰安妇”多集中于日本和朝鲜及东南亚的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分析则缺乏系统和全面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作者的研究领域与东南亚、日本和韩国有关，并在这方面占有大量的原始材料；二是这些年来中国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具有规模。但不论如何，乔治·希克斯的研究成果能在中国出版发行，是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的一件好事，至少它可能给人带来许多思考。

笔者仅想借此机会再说几句，以正视听。

（一）“慰安妇”与“公娼”不能混为一谈

“公娼”是一些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靠出卖肉体生活的女性。她们的人格、灵魂和尊严在交易过程中就已经丧失殆尽。交易双方完全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关系，只要对方付钱，这些女性就可以把自己的肉体交给对方。而“慰安妇”则是日军的“性奴隶”。日本人用欺骗、威胁、恫吓直至劫持手段把她们强征而来，她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和日军铁蹄下的殉葬物。这样一些手无寸铁的女性，在日本军队刺刀、狼狗，还有汉奸、朝奸的胁迫下，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牛马”。就像英国小说家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写的那样，“礼拜五”能成为鲁宾逊的仆人和“奴隶”，关键在于鲁宾逊手中握有可随时杀死“礼拜五”的火枪。被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浊化了的日本比任何国家都信奉这种弱肉强食的道理。

在承认“公娼”制的国家里，尽管从业“公娼”必须接受国家和顾客的税捐盘剥，并忍受社会的凌辱，但是这些国家至少赋予了她们以“合法”的社会身份，她们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至少可以在出卖肉体商品属性的过程中得到这些国家和社会的保障。作为“性奴隶”的“慰安妇”，连“公娼”的商品属性都被剥夺。这是“慰安妇”与“公娼”的最本质区别。

日本军国主义为军队配备随军“慰安妇”由来已久。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把“公娼”制度引入朝鲜，作为一种“军需”，在军营附近设置妓院，满足海外日本驻军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部分女性和职业妓女被征到日军中服务。实际上，这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行慰安制度的雏型。“慰安妇”在日语中是个特殊的代名词。使用时，日军在“慰安妇”前面还要加上“随军”和“从军”字样。在他们看来，“慰安妇”像是战地女护士一样，是开往前线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日军序列里根本找不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部队，而分布于各个战场上身着日本军服的女性除了护士之外主要是“慰安妇”。战争期间，“慰安妇”被当成“特殊的战备物资”被运往各个战场。

（二）“慰安妇”产生的社会背景

慰安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打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可以说，是日本传统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下的怪胎。分析日本慰安制度，需要从多方面谈起。

首先，封建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思想杂交，孕育出“慰安妇”这个战争畸形儿。战前的日本把男人和女人分为不同等级，女性被看作是二等公民和“次人类”，是男人的附属品。战争爆发后，这种占有欲不仅被倾泻到了日本女性的头上，而且也有恃无恐地发泄到异国女性的身上。这种占有欲延伸到女性的身上，便是丧失人性和良知的野蛮摧残。

其二，20世纪初的日本高压政治奠定了社会沉沦的基础。高压下的日本国民在经济萧条和大战前的混浊气氛中纷纷沉溺于享乐主义。那个时代的日本有个别名：“色情、变态和颓废的国家”。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成了缓解日本人心理压力的强心剂。1927年的《朝日新闻》刊文称，那时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公然

在浅草区招摇过市，咖啡因在各大城市里泛滥成灾，而在东京有名的浅草区，沉沦的男女脱掉内裤，“以飧来者”。耳濡目染，沉沦的社会风气培养出了堕落的一代，给后来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参战的日本官兵们留下了放荡纵欲的阴影。一方面，他们见面点头哈腰，另一方面，从骨子里发出了对异族的蔑视和仇恨。

其三，军国主义扭曲了一代或几代日本人的精神。在军国主义的氛围里，日本人的人性和精神完全扭曲。在他们看来，杀人放火是为天皇尽忠的表现，强占民女是为了把这些女性的肉体 and 灵魂“奉献”给那些“有功之臣”。在日本右翼分子看来，所有的“强征”也就成了“志愿”。如果说日本男性是用躯体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牺牲品的话，那么那些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深重的日本女性则以她们的肉体充当军国主义牺牲品的牺牲品。

总之，日本慰安制度的兴起是日本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其结果是，军国主义所豢养的日本“皇军”不仅把异国土地作为践踏的对象，而且还把异国的妇女当成了蹂躏的目标。这就使“皇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支淫欲横流的兽军。这也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最不人道和最为残忍的一页。

（三）“慰安妇”产生的直接原因

其一，战争中，一刻也不能离开女性的这支兽军因性病而战斗力大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领教过性病对其军队的打击。从 1918 年 1 月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向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增兵 7 个师团，计 7.2 万人。但从 1918 年 7 月~1922 年 6 月，日本派遣军中发现性病 2012 人，其中宪兵 26 人。据估计，如果把轻微受感染的性病患者算进来，日本士兵患性病的感染数字占出兵总数的七分之一，即 7 个师中有 1 个师为性病所击垮，性病减员远远超过了战斗减员。如此“惨痛后果”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再次走上侵略之路时不能不考虑出兵西伯利亚

时的“惨痛代价”，建立慰安制度便被有关方面提了出来。1939年日本军医早尾禄雄在其《战场上的特殊现象及对策》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军队性病流行，导致战斗力下降。他认为，既然日本不能解决官兵的嫖娼问题，那么只有建立一种慰安制度，来满足他们的性要求。

其二，担心日军的暴行引起占领区民众更多的反抗。连日本的学者也认为，日军的战场上使用“慰安妇”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因为日军对占领国妇女的兽行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和占领国更强烈的反抗。1932年，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竭力主张陆军仿效海军的做法，建立陆军慰安所。在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冈村宁次就说过，“现在常发生强奸案，请长崎县知事招募‘慰安妇’之后，强奸事件中断，甚为欣喜。”不久，他又说，“目前各部队均设有‘慰安妇’随行团，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其编撰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中指出，日本高层决策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好推行慰安制度，牺牲占领国（中国等国）妇女、殖民地（朝鲜）妇女和部分贫穷的日本妇女，来维持日军的纪律，让“慰安妇”们成为防止日军暴行的“安全阀门”。这并不是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怜惜占领国的妇女，而是有更险恶的目的，即把占领国的民愤降低到最低点，其核心仍是为其推行侵略战争服务。

其三，抚慰日军官兵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一方面，这些为“武士道”精神所武装起来的官兵可以在必要时把对天皇的尽忠作为“成仁的最高境界”，可与敌手同归于尽或剖腹自杀；另一方面，对大多数男性参战者来说，在死与生的选择中，他们还是选择了后者。久陷战场，战争的恐惧无时不在侵害着日军官兵的心灵，于是“慰安妇”便成了这些游离于生死线上官兵的寄托。1936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3联队的《阵中日记》写道：“现在，‘慰安妇’增多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日本所建立的慰

安制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维系这支兽军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妇女在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战争中真的成了一种“特殊的战备物资”。1941年10月18日，当时的日本首相兼内务省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回答记者问时，把这种丧尽天良的残暴行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这种事情，就像你不能否认美国士兵请假去驻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的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备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备物资。”在这个军国主义者的眼里，这种“特殊的战备物资”不再有人类的尊严，更谈不上人类的权利。可想，一个把同类比作“物资”的人其内心还有什么良知可言。

（四）否认强征在于否认慰安制度

按照日本的一些辞书的解释，“‘慰安妇’就是在战场上满足官兵性需要的随军妓女”。日本的一位学者这样写道：“由于到外国去的日军在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从军‘慰安妇’，从军‘慰安妇’大都来自朝鲜半岛，也包括日本占领区的妇女。”日本的一位前官房长官则认为，“‘慰安妇’问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年纪大的人都不足为奇，当时有‘公娼’制度，战时还多给钱。”笔者认为，如果把“慰安妇”简单地当作“公娼”，那也说明日本右翼分子的头脑也太单纯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日本右翼分子来说，不承认强征，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直到全面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在日军中实行的慰安制度。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否认为强征，否认慰安制度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慰安制度和与之相伴随的“慰安妇”？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来自有关国家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日本便在华设立了慰安所，实行慰安制度。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规模较小。日本政府为了应付中国政府和租界的禁娼政策，把一批日本女性骗到中国为日本军兵“慰安”。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基地开设了海军专用的慰安所。这一时期的慰安所的规模只限于日军重要的军事设施里，其性质也大多数由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合办。充当“慰安妇”的妇女多是由日本国内诱骗而来的。

第二阶段是 1937 年 8 月到战争结束。日本入侵上海后，大规模地开设了慰安所。到战争后期，日军在华建立的慰安所一直开到了滇缅战场。从“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慰安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规模上，日本当局不仅征召本国女性，而还把目光放在了朝鲜半岛，投向了在中国女性，而且慰安所也不仅仅局限于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慰安制度在这一时期推广到了所有侵华部队中。在中国大陆，大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几乎都有慰安所的存在。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一方面准许更多的日本移民在东北开设高级宾馆，为军官提供“优质的性服务”，开设妓院为士兵解决性饥渴；另一方面又急电日本军部，请求为关东军提供更多的“慰安妇”。在性质上，这一时期的“慰安妇”已经不再是仅为了满足日军兽欲而设立的“安全阀门”和“替罪羊”，而完全成为了日本当局维系日军士气和继续推行战争政策的重要手段。如 1941 年 7 月，日本关东军头目梅津美治郎就提出了要征召 2 万名朝鲜“慰安妇”的计划，以鼓励士气日趋低落的日军官兵。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到底强征了多少亚洲女性充当日军的“慰安妇”？这也许会永远是个千古奇冤，是一个永远的谜。因为作为“特殊的战备物资”，“慰安妇”的征召和去向并没有登记和建立档案，即使有，这些档案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